

国际关系

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视角 看巴西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英] 莱斯利·贝瑟尔

内容提要: 本文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审视巴西和拉丁美洲的关系。学界曾普遍认为“拉丁美洲”概念最先是由法国人提出的,但事实上,为了强调共同拥有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一些旅居巴黎的西属美洲作家和知识分子早就已经开始使用“拉丁美洲”这种说法了。在取得独立后的1个多世纪里,无论是西属美洲学界还是各共和国政府,都没有将巴西看作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而同一时期,巴西政府与学界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并从1889年以后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美国。冷战期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逐渐将巴西纳入“拉丁美洲”概念,但巴西学界和政府仍不认为巴西是该地区的组成部分。20世纪初美国与巴西间维持了一种特殊的同盟关系,但二战以后,美国既没有帮助巴西获得其所期盼的政治地位,也没有继续向它提供特殊的经济援助。深感失望的巴西政府开始推行旨在增进与南美洲各邻国关系的对外政策。

关键词: 拉丁美洲 巴西 君主制 泛美主义 巴美关系

作者简介: 莱斯利·贝瑟尔,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前所长,牛津大学巴西研究中心创始主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学者。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649(2017)03-0099-24

* 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ell)教授著述颇丰,其中最著名的是其主编的12卷本的《剑桥拉丁美洲史》(1984—2008年)。本文系作者2016年11月撰写的英文稿修订版,其最初文本载于剑桥《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10年第3期。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拉丁美洲文化学科”系列推介之一。

一 “拉丁美洲”概念的由来

自约翰·莱迪·芬兰 (John Leddy Phelan) 1968年发表《泛拉丁主义、法国干涉墨西哥 (1861—1867年) 和拉丁美洲概念的起源》之后的几十年间^①, 学界普遍认为“拉丁美洲”的概念最先是由法国人提出的。当时法国学界使用“Amérique Latine” (拉丁美洲) 一词为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在墨西哥的帝国主义行径辩护。芬兰指出, 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似度与同一性来看, 所有的“拉丁人”都应视法兰西帝国为主导力量和灵感来源; 同时, 这也有助于他们抵制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撒克逊人的影响和控制。与“撒克逊族裔”的概念不同, “拉丁族裔”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米歇尔·舍瓦利耶 (1806—1879年) 的《北美快报》中。跟随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脚步, 舍瓦利耶侨居美国一段时间之后, 去了墨西哥和古巴。后来, 他成了法兰西学院、国务委员会和参议院的重要成员, 并且担任过拿破仑三世的贴身顾问。在1862年为《两个世界评论》撰写的文章和《古代和现代墨西哥》一书中, 舍瓦利耶长篇大论地为1861年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进行辩护。但芬兰的研究认为, “拉丁美洲”一词首次出现于蒂塞兰德1861年1月在《拉丁族裔评论》杂志发表的《拉丁世界现状》一文中。

然而, 西属美洲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 (其中许多人当时居住在法国) 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拉丁美洲”这种说法了。最有可能首先使用这一术语的3位学者分别是: 哥伦比亚记者、诗人兼批评家何塞·玛丽亚·托雷斯·凯塞多 (1830—1889年), 智利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 (1823—1865年), 以及拥有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的法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兼外交官胡斯托·阿罗塞梅纳 (1817—1896年)。

1856年, 托雷斯·凯塞多创作了一首名为《两个美洲》的长诗, 并于1857年2月发表于巴黎发行的西班牙语报纸《海外信使报》。凯塞多在诗中多次提及“南美洲”和“西属美洲”, 在诗尾积极号召“南方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北方的美洲”。他随后还发表了《拉丁美洲联盟形成的基础》和

^① John Leddy Phelan, “Pan-Latinism, French Intervention in Mexico (1861–1867) and the Genesis of the Idea of Latin America”, in Juan A. Ortega y Medina (ed.), *Conciencia y Autenticidad Históricas: Escritos en Homenaje a Edmundo O’Gorman*, Mexico City, UNAM, 1968, pp. 279–298.

《拉丁美洲联盟》。1866年，在纪念对所有“拉丁美洲人”影响深远的阿根廷独立战争领袖圣马丁的活动上，托雷斯·凯塞多强调“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我深切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然而，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祖国，那便是拉丁美洲。”^① 1856年，毕尔巴鄂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南美人民社会运动”。同年6月22日，他对来自几乎南美所有共和国的30多人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讲中谈到自己关于“拉丁美洲之根”与“拉丁美洲联合”的思考，随后这次演讲内容被制成了以《美洲倡议：共和国联邦议会的构想》为名的小册子公开发表。^② 1856年7月20日，代表巴拿马省的哥伦比亚自由派参议员阿罗塞梅纳在波哥大的发言中也使用了“拉丁美洲”一词。此外，这个词还出现在阿罗塞梅纳分别于7月15日和29日发表在《新格拉纳达报》的系列文章《论美洲问题及其重要性》中。他后来在《美洲联盟构想研究》^③一文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说法。与此同时，一些西班牙自由派学者，如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尔（1832—1899年）和弗朗西斯科·皮耶·马戈尔（1824—1901）也逐渐开始采用“拉丁美洲”的表述方式。^④ 然而，阿根廷历史学家兼律师卡洛斯·卡尔沃（1824—1901年）很可能是首位将这一表述应用到学术著作中的学者，其代表作包括《拉丁美洲国家条约、公约、投降和休战协议及其他外交行为录》和《1808年以来的拉美革命史录》。

尽管在脱离西班牙独立时西属美洲分裂成10个独立的共和国（到19世纪中叶已经分裂为16个），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属美洲学者及作家仍然保持着共同的西属美洲意识和身份的观念——这种观念早期由西蒙·玻利瓦尔提出，后来被安德烈斯·贝略大力推广。这种观念远比本地的或地区的“民族主义”更加强烈。此外，米歇尔·舍瓦利耶等人声称，“拉丁美洲”同

① 参见 Arturo Ardao, “La Idea de Latinoamérica”, en *Marcha*, Montevideo, November 27, 1965; Arturo Ardao, *Génesis de la Idea y el Nombre de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1980.

② 参见 Miguel A. Rojas Mix, “Bilbao y el Hallazgo de América Latina: Unión Continental, Socialista y Libertaria”, en San José, *Cahiers du Monde Hispanique et Luso - Brésilien - Caravelle* 46, 1986 and *Los cien nombres de América Latina*, 1991.

③ 例如参见 Aims McGuinness, “Searching for ‘Latin America’: Race and Sovereignty in the Americas in the 1850s”, in Nancy P. Appelbaum, et al. (eds.), *Race and Nation in Modern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2003.

④ 参见 Arturo Ardao, *España en el Origen del Nombre América Latina*, Montevideo, 1992.

“另一个”美洲——美国截然不同^①，他们甚至还把美国当作敌人。这一时期美国的一系列扩张行为，如 1845 年吞并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战争（1846—1848 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企图控制巴拿马地峡航线、对古巴的不断威胁，特别是入侵尼加拉瓜（1855 年），使得越来越多的南美洲学者确信，美国只能以牺牲“拉丁美洲”为代价实现“命定扩张论”。19 世纪 60 年代，由于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1861 年）、西班牙吞并圣多明各（1861—1865 年）并出兵攻打秘鲁（1864—1866 年）和智利（1865—1866 年），西属美洲学界开始将法国和西班牙视为与美国同质的敌人。因此，学者们更愿意使用“西语美洲”“西裔美洲”或“南美洲”。对他们来说，“拉丁性”同“拉丁欧洲”（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紧密相连，代表着保守主义、反自由主义、反共和主义、天主教。

在 19 世纪中叶几十年间共同的西属美洲或拉丁美洲身份思想形成史上，阿根廷是一个有趣的特殊案例。独立后的阿根廷作家、政治思想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 年）、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1810—1884 年）和最著名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 年）。他们将阿根廷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视为欧洲文明在野蛮的西属美洲背景下的化身，他们深受英国、法国和北美思潮的影响，坚信阿根廷拥有发展成“南美洲的美国”的潜力。阿尔韦迪甚至将美国称为“宇宙的模范”，而萨米恩托也认为美国象征着“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此时的阿根廷学者常常以拉美向导或导师的身份自居，他们对西属美洲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几乎从不使用“拉丁美洲”这种表述，自然也没有对美国和法国入侵墨西哥的行径提出抗议。仅有一小部分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表现出了和其他西属美洲学者相近的“拉丁美洲”情结，包括阿尔韦迪（在他疏远了米特雷和萨米恩托之后）、卡洛斯·圭多·斯帕诺（他认为阿根廷是共和国姐妹联盟中的一员）、何塞·埃尔南德斯和奥莱加里奥·安德拉德（代表作有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表的诗歌《阿特兰蒂达：美洲拉丁族裔的未来之歌》）。但是，少数派民族主义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拉丁美洲”情结，却被尼古拉斯·沙姆韦称作是“厚颜无耻的反常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积极宣扬“拉丁美洲”表述的法国人，还是对它

^① 正如沃尔特·米格诺罗（Walter Mignolo）在《拉丁美洲的概念》（The Idea of Latin America）（Oxford, 2005）一书中提醒我们的，“拉丁族裔”和“拉丁美洲”的概念把处于后殖民时代的西属美洲“白人”精英继续归类为克里奥尔人。或者说，在强化了他们普遍认同的欧洲根源的同时，也将其与当地的印第安人、混血人和黑人等群体分开了。

逐渐警惕的西属美洲学者，他们讨论的仅仅是该不该把“拉丁美洲”用作“西属美洲”的同义词。也就是说，除卡尔沃以外，学界并没有将巴西当作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① 需要强调的是，率先使用“拉丁美洲”一词的西属美洲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除了卡尔沃），甚至包括他们的法国和西班牙同行，都不认为“拉丁美洲”包括巴西。“拉丁美洲”只是西班牙语美洲的另一个指称。

从巴西国内来看，当时学界虽然承认巴西与西属美洲拥有同样的“伊比利亚”和“天主教”背景，但是对他们来说，巴西这个国家在地理、历史（葡萄牙为保持独立而长期对抗西班牙，以及葡属美洲和西属美洲的不同殖民经历）、以种植园农业和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特别是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都与各西属美洲共和国有着根本区别。除此之外，对巴西学者来说，相比邻国通过“野蛮”暴力换来的“不稳定的”共和制，巴西实行的君主制度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和平过渡和领土完整的“文明”基石之上的。同时期的文学，无论是安东尼奥·戈卡尔弗斯·迪亚斯的诗歌，还是何塞·德阿伦卡尔的小说、艺术以及音乐作品，都充分强调了巴西浪漫主义与西属美洲浪漫主义的明显区别。^②

由于拒绝接受“拉丁美洲国家”的身份，当巴西本国作家与学者尝试从全球视野为巴西定位时，很少将西属美洲作为参照对象，而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或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美洲大陆。在他们看来，这片大陆上的所有美洲人共同享有宝贵的印第安文化遗产——这种信念也成了激发众多优秀作品的灵感来源。安东尼奥·卡洛斯·戈梅斯于1870年创作了歌剧《瓜拉尼 II》。若阿金·曼努埃尔·索萨·安德拉德（1833—1902年）同年在纽约完成了歌颂极具传奇色彩的哥伦比亚印第安人的长诗。著名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于1875年发表了第三部个人诗集《美洲人》。主张建立共和制的巴西学者普遍将美国视为效仿的榜样。他们于1870年在里约热内卢发布了《共和宣言》，《宣言》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来自美洲，我们要做美洲人。对于共和派学者来说，很可惜巴西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因为从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特别是他们受帝国或君主制政府模式影响的观念来看，巴西与西属美洲或美国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异。然而，也正因为此，

^① Nicolas Shumway, *The Invention of Argent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1, p. 244.

^② 参见 Gerald Martin, “The Literature, Music and Art of Latin America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in 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III,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1985.

共和派学者认为巴西应当从政治和文化方面入手，尽可能地向各西属美洲共和国和美国靠拢。

二 19 世纪的西属美洲国家联盟与巴西

19 世纪初，美国的政治家，尤其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和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了独立于欧洲而存在并推行共和制的“西半球”的概念。^① 在与 1816 年出任葡萄牙和巴西联合王国部长的好友阿贝·科雷亚达塞拉的多次交谈中，杰斐逊曾反复强调（1889 年才开始推行共和制的）巴西是其“美洲体系”战略中的重要环节。^② 1823 年 12 月，美国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坚决反对一切欧洲政体的扩张，决不允许任何欧洲势力干涉这一半球任何角落的任何事务。”然而，众所周知，门罗宣言并没有带来美国实质性的行动，因为当时阻止欧洲势力侵入西半球的强大舰队并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英国。因此，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对美国“公然以美洲各国联盟领导人自居并呼吁联盟成员一致对抗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外交政策深表担忧。^③ 然而，曾于门罗政府期间出任国务卿、其后当选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外交理念。他虽然也反对欧洲插手美洲事务，但对建立一个包括南美洲原西葡殖民地在内的“美洲体系”没有多大的兴趣。他认为南美洲国家受伊比利亚和天主教文化影响极深，且大都位于热带地区，所以他们必定是落后且不稳定的。而就“美洲体系”来看，亚当斯曾写道“我们已经拥有了美洲体系，美国即‘美洲体系’的全部。”他认为与新独立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国家进一步交往不会带来任何政治或商业利益。^④ 受亚当斯的影响，在接下来的 60 年里，美国并没有对巴拿马南部的“西半球”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举措。

① 参见 Arthur P. Whitaker,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dea: Its Rise and Decline*, Ithaca, NY, 1954. 佛罗伦萨航海家埃默里戈·韦斯珀奇（Amerigo Vespucci）于 1507 年第一次用“美洲”一词来代指由欧洲人于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发现的广袤大陆（或者说由巴拿马地峡连接的两个大陆）。关于这一话题的经典著作是 Edmundo O' Gorman, *La Invención de América*, Mexico, 1958.

② 参见 Kenneth Maxwell, *Naked Tropics: Essays on Empire and other Rogues*, New York, 2003.

③ 引自 D. A. G. Wadde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Latin American Independence”, in 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 III,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1985, p. 219.

④ 引自 Lars Schoultz,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of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MA, 1998, pp. 10 - 11.

独立运动时期的西属美洲政治家计划成立一个西属美洲共和国联盟。玻利瓦尔本人（特别是在1815年的《牙买加来信》中）强调，应当构建一个近似“单一国家”的“美洲大同盟”，以对抗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侵略和美国的扩张行动。1824年12月，玻利瓦尔邀请除美国、海地和巴西之外的所有美洲国家的代表出席旨在“处理美洲事务”的巴拿马大会。由此可见，让玻利瓦尔提高警惕的不单是美国，还有巴西。在他看来，无论从语言、历史还是文化方面来看，巴西对于西属美洲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构成仍旧依赖于已被西属美洲诸国摒弃的黑奴贸易和奴隶制。同时，延续君主制且自称“帝国”的巴西在当时被认为是欧洲的一部分，它在3次拉普拉塔河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战略野心更加剧了其邻国的危机意识。^①

巴拿马大会于1826年再次召开，但却以失败告终：并不是所有的受邀国都派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而在出席国中也只有大哥哥伦比亚签署通过了永久联盟条约。此后，为了更好地抵御美国的领土扩张和法国与西班牙的入侵，西属美洲诸共和国又在利马（1847—1848年）、智利的圣地亚哥（1856年）、华盛顿（1856年）、利马（1864—1865年）和加拉加斯（1883年）（为纪念玻利瓦尔诞辰100周年）等地多次召开了美洲大会，但都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这期间，西属美洲始终没有放松他们对巴西的警惕，它们对这个占南美洲面积一半且讲葡萄牙语的“大邻居”充满疑虑。虽然也有一些国家曾提议邀请巴西代表与它们一道出席美洲大会，但终因不能发出官方邀请而遭到巴西的拒绝。^②

处于第二帝国时期（1840—1889年）的巴西政府也始终没有对邻国提出的“美洲联盟”构想计划表现出多大兴趣。在帝国政府看来，广袤的大西洋海岸线毫无疑问是巴西作为大西洋世界一部分的有力证据；与英国的经济政治联系以及与葡萄牙、法国在文化方面的联系，也被作为这种划分的有效依据。此外，与许多西属美洲国家不同，巴西并没有感受到来自美国、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政治威胁。18世纪到19世纪初，巴西外交官将西属美洲称为“西班牙语美洲”或“南方美洲”，或者更为简洁的“南美洲”。除了延续葡萄牙

^① 后来哥伦比亚副总统桑坦德邀请巴西派代表前往巴拿马，巴西政府应邀指派了两名代表，然而，第一任没能到达巴拿马，第二任根本就没有离开巴西。美国后来也接到了出席邀请，但并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

^② 参见 Luís Cláudio Villafane G. Santos, *O Brasil Entre a América e a Europa: O Império e o Interamericanismo (Do Congresso do Panamá a Conferência de Washington)*, São Paulo, 2004.

统治下的巴西对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战略地位所表现出的兴趣以外，这一时期的巴西政府对西属美洲几乎都漠不关心。独立后的巴西总共3次派兵出征拉普拉塔河：第一次（1825—1828年）是与拉普拉塔河诸省联盟争夺河东岸的控制权（乌拉圭于此战后获得独立）；第二次（1851—1852年）是联合阿根廷恩特雷奥斯省和乌拉圭对抗阿根廷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第三次（1864—1870年）是联合阿根廷与乌拉圭对抗巴拉圭独裁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即巴拉圭战争）。

三 世纪之交的美国、西属美洲和巴西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区域力量。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扩张政策与行动，美国越来越强烈地表达着它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乃至整个南美洲的霸权主张。这些政策和行动包括：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在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期间的言论“美国是这个大陆上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它的命令就是法律，有权干预所有主体”，1898年美军出战西班牙以及随后占领古巴和波多黎各，1903年美军登陆巴拿马并策动其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1904年12月罗斯福总统进一步推行门罗主义，干涉多米尼加（1905年）和墨西哥（1914—1915年），占领尼加拉瓜（1912—1933年）、海地（1915—1934年）和多米尼加（1916—1924年）。同时，美国还提出了“泛美主义”的概念，强调美洲共同的地理历史条件以及对共和、自由与民主观念的共识。除此之外，为了尝试将脱离欧洲的“西半球”概念制度化，美国还举办了一系列的美洲国家国际会议（通常被称为“泛美大会”）。^① 这些努力旨在增加美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量，促进对该地区的投资，创造稳定或可预见的政治环境，保障其在“西半球”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同时铲除欧洲对南美洲尚存的一切帝国主义野心。

然而，西属美洲各国政府普遍对美国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他们强烈谴责美西战争、美国在古巴建立保护基地以及“门罗主义”的复兴，谴责美国对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干涉行为。他们很自然地担心，“泛美主

^① 第一届美洲国际会议于1889年10月至1890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从那以后，二战之前的会议分别在墨西哥城（1901—1902年）、里约热内卢（190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年）、圣地亚哥（1923年）、哈瓦那（1928年）、蒙得维的亚（1933年）和利马（1938年）举行。战后的两次会议分别在波哥大（1948年）和加拉加斯（1954年）举行。

义”只不过是美国用来维护其在该地区经济和政治霸权的舆论武器。然而，1889年建立共和制的巴西却从一开始就热情拥护“泛美主义”，并试图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一共和国时期（1889—1930年）的巴西政府在外交导向方面并没有做出有别于帝国政府的重大改动。他们仍旧对“讲西班牙语的人”和“拉丁美洲诸国”漠不关心。这一期间，巴西通过协商或必要时的武装行动（大体上都很成功）解决的边境问题主要有：1895年与阿根廷、1903年与玻利维亚（为争夺阿克里州）以及随后与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圭之间的边界争端。同时，巴西还尝试（相比之下不那么成功）与阿根廷、智利和南锥体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巴西外交部更愿意强调与欧洲国家（特别是与英国和德国）以及越来越受重视的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时的共和国政府来说，巴西和美国分别为西半球南北两个美洲的绝对大国。虽然两国实力并非旗鼓相当，但它们都不属于“西属美洲”或者“拉丁美洲”，且都是政局稳定并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经济潜能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巴西政府还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前夕的世界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经历巨大的变化，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被美国所取代，因此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巴西外交部部长巴朗·杜里奥·布兰科（1902—1912年）和驻美国大使若阿金·纳布科（1905—1910年）开启了外交政策的“美国化”进程。在新导向的引领下，美国不仅被看作防止欧洲帝国主义再度扩张的有效屏障（对巴西来说，欧洲的帝国主义远比美国的帝国主义威胁要大），也是保证西属美洲政治和平与局势稳定的中坚力量。所以，与其他南美国家不同，巴西没有对美西战争表示谴责或不满；在支持罗斯福宣言和门罗主义的同时，对美国武力干涉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行径也熟视无睹。此外，巴西政府在所有泛美大会中对美国表示积极支持。^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中，巴西是唯一追随美国在1917年对德国宣战的南美大国，而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和阿根廷均保持了中立。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巴西变成了南美洲唯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1926年从联盟理事会卸任后，促进巴美关系更是成为巴西外交部的头等大事。美国也逐渐取代英国而成为巴西最主要的贸易合作伙

^① 关于从共和国宣布成立到一战期间巴西与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讨论，参见 E. Bradford Burns, *The Unwritten Alliance: Rio-Branco and Brazilian-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1966; Joseph Smith, *Unequal Giants: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1889-1930*, Pittsburgh, 1991.

伴（也就是说，美国变成了巴西工业制成品和资本品的主要供应商，并且一直都是巴西主要出口产品咖啡的最大进口国）和外资来源国（包括证券组合投资和直接投资）。虽然与德国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也逐渐开始受到重视，但美国仍然是巴西最青睐的外交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巴西是美国在南美洲最忠实的战略伙伴。除了为美军提供物资补给以外，巴西还分别在贝伦、纳塔尔和累西腓为美军的北非战场作战提供军事基地，并最终于1942年8月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1944年，巴西派出了一支由2.5万人组成的远征军加入盟军，奔赴意大利战场作战。^①

四 世纪之交的西属美洲学界

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期间的西属美洲学者普遍对美国（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文化）及其倡导的“泛美主义”充满了敌意，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美古战争无疑成了这种矛盾的催化剂。绝大多数学者都赞成“两个美洲”（一个指美国，另一个指西属美洲或者“拉丁美洲”）的概念^②。此外，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还促使他们常常直接将“我们的美洲”作为“西属美洲”和“拉丁美洲”的代名词。对西属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学者来说，以“拉丁美洲”为代表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远优于象征着“撒克逊美洲”的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波多黎各作家欧亨尼奥·玛丽亚·德奥斯托斯（1839—1903年）、古巴作家何塞·马蒂（1853—1895年）均就这一主题发表过系列文章。在1889—1890年和1891—1895年间，马蒂分别于华盛顿和纽约将其作品发表在《画报》《自由党报》和《民族报》3种报刊上。乌拉圭学者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17年）的长篇散文《爱丽儿》和文集《瞭望美丽新世界》深刻地影响了西属美洲世纪之交的一代人，特别是青年学者。罗多认为“美国佬”对西属美洲的文化和道德渗透甚至超过了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他还称“北美引力”的负面影响已经危及“拉美人的精神”。哥伦比亚作家何塞·玛丽亚·瓦加斯·维拉（1860—1933年）的代表作《蛮夷当前》也是当时广为流

^① 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巴美关系的讨论，参见 Eugênio Vargas Garcia, *Entre América e Europa: a Política Externa Brasileira na Década de 1920*, Brasília, 2006; Frank D. McCann, *The Brazilian - 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5*, Princeton, 1974.

^② 参见 Monica Quijada, “Latinos y Anglosajones: El 98 en el fin de Siglo Sudamericano”, en *Hispania* (Madrid), Vol. LVII, No. 2, May - August 1997, p. 196.

传的经典著作之一。这部作品最先于 1890 年在罗马发表，随后，添加了不同副标题的增补版——例如《蛮夷当前：大敌美国佬》——也相继面市。其最终版本于 1923 年在巴塞罗那定稿出版。

巴西奴隶制的废除（1888 年）与共和制的建立（1889 年）使得部分西属美洲学者开始将“伊比利亚美洲”这个概念作为西属和葡属美洲的总称，强调他们之间在文化、宗教、政治、法律和种族融合等方面的相似之处。然而，与 19 世纪中叶的前辈相同，他们仍然没有对巴西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但先后出任阿根廷驻巴西（1894—1896 年）和美国（1896—1905 年）外交官的马丁·加西亚·梅罗却是一个例外。他于 1897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杂志（*La Biblioteca*）上发表了众多有关巴西知识界、文化界和文学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录在合集《巴西学界：文学印象与笔记》中。但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将巴西排除在“我们的美洲”或“拉丁美洲”等概念之外。从另一方面来讲，那些因受经典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而对西属美洲前途做出悲观预测的学者们，也没有将巴西作为他们批判的对象之一。

阿根廷学者曼努埃尔·乌加特（1875—1951 年）是第一个公开提出应该将巴西引入“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人”和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对峙的“大陆的优等部分”等概念之中的西属美洲学者。乌加特早期的代表作有《拉丁美洲的未来、种族、领土与道德完整及内部组织》。此书还有以《西班牙语美洲的未来》为名的其他版本。同时，乌加特还于 1910—1917 年间在巴塞罗那、巴黎、纽约、墨西哥和其他南美洲地区进行了多次演说，演说合集最终以《我的西裔美洲运动》为名面市。上述所有作品仅以西属美洲为主要议题。然而，乌加特在 1912 年 7 月于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题为“拉丁美洲的未来”的演讲中，将巴西纳入讨论范围。在作品《一个大陆的命运》中，乌加特表示巴西只不过是“大西班牙”的一个变体而已，所以必须将它作为“我们（拉丁美洲）国家大家庭的组成部分”。乌加特还强调说必须把“半拉美主义”的分裂思想扼杀在摇篮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属美洲学界对巴西的看法仍旧没有多大的改变。秘鲁著名学者维克多·劳尔·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 年）1935 年于圣地亚哥发表的《印第安美洲向何处去？》中用“印第安美洲”代替了“拉丁美洲”，客观地把西属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也纳入到了“南美”的概念中。同样地，为了唤醒种族多样性意识，秘鲁学者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895—1930 年）在其文集《我们的美洲的主题》中引入

“印第安—伊比利亚美洲”的概念。但是，无论是新概念“印第安美洲”或“印第安—伊比利亚美洲”，还是已被广泛使用的“拉丁美洲”中，都不包括葡属巴西。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看到了这种概念排斥的不合理性和弊端。比如，墨西哥学者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年）在其论文《巴西的问题》中断言巴西将成为南美大陆的未来之国，所以西属美洲学界必须尽快将其与西半球的其他共和国同等对待。1922年，巴斯孔塞洛斯代表墨西哥出席巴西为脱离葡萄牙独立而举办的庆祝活动。随后，他于1925年出版的《宇宙种族》一书中阐述了在被他称为“伊比利亚美洲种族使命”之旅中的所见所闻及受到的启发。在该书最著名的开篇章节《混血》中，巴斯孔塞洛斯阐述了巴西的种族混血与融合的情况。1934年，巴斯孔塞洛斯在其名作《玻利瓦尔主义与门罗主义：伊比利亚美洲的主题》的开头写道：我们将把建立联合所有受西班牙文化影响的南美共和国同盟的理想称为“玻利瓦尔主义”；把企图通过“泛拉美主义”政策将20多个南美西语国家纳入北美帝国的撒克逊式理想称为“门罗主义”。巴斯孔塞洛斯强调说“墨西哥是墨西哥人的，西裔美洲是西裔美洲人的”。同时，他还表达了对巴西的担忧，即巴西并没有与西属美洲诸国一道反对美国的泛美主义，所以西属美洲共和国必须对巴西自身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野心提高警惕。当得知里约热内卢的一座著名公共建筑被巴西政府用来纪念美国总统门罗时，巴斯孔塞洛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巴斯孔塞洛斯的观点对1930年出任墨西哥驻巴西大使的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雷耶斯写了50余篇有关巴西文学与文化的文章。^①然而，雷耶斯也只是一个例外，因为在当时几乎找不出对巴西感兴趣的西属美洲作家、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当时的西属美洲人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国民身份和文化，此外，他们也对“西裔美洲”或“拉丁美洲”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有别于美国和巴西文化的“西属美洲”文化）感兴趣。著名作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1884—1946年）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墨西哥、古巴和阿根廷生活过很长的时间。他以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于1940—1941年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内容为素材，编撰了《西班牙裔美洲文学潮流》。此外，其作品《西班牙裔美洲的历史及文

^① 参见 Fred P. Ellison, *Alfonso Reyes e o Brasil: Um Mexicano Entre os Cariocas*, Rio de Janeiro, 2002.

化》也于他死后发表。然而，这两部作品中均没有提到关于巴西的任何信息。

五 巴西学界对巴西定位与道路的争议

从巴西国内来看，第一共和国时期巴西的重要知识分子对美国及泛美主义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对者认为，保持与西属美洲邻国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好处的。与北美友好派相比，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邻国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他们对一些西属美洲共和国，特别是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肯定。然而，即便是敌视美国的反对派学者在对待各西语邻国时，仍没能摆脱传统的负面视角，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对“拉丁美洲”“我们的美洲”“伊比利亚美洲”或“印第安美洲”等概念产生兴趣或认同。

爱德华多·普拉多（1860—1901年）在《美洲的幻像》一书中强烈谴责了美国傲慢的外交政策和对西属美洲诸共和国领土的侵占和经济掠夺。然而，普拉多是君主制的坚定支持者，他对西属邻国采用的共和制表示轻视，并且质疑它们能否团结起来抵抗共同的敌人。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倡导的“泛美主义”也不过是一个终将落空的幻景。普拉多是最早将巴西称为“巨岛”或“独立大陆”的学者之一，他声称曾有地质学家告诉他拉普拉塔河与亚马孙河曾经是连在一起的。即便这只是一直没有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普拉多仍坚持认为，无论从语言、历史还是社会道德及价值观念方面来讲，巴西和西属美洲各国之间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同样反对泛美同盟的巴西学者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利马（1867—1928年）在巴黎发表了《泛拉美主义：门罗、玻利瓦尔、罗斯福》。他在文中指出，以“门罗主义拉丁化”和建立“西半球霸权”为思想核心和行为导向的“罗斯福主义”其实是“终极门罗主义”的延续。作品《西属美洲印象》一书收录了曼努埃尔·利马1904—1906年间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创作并发表在《圣保罗州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而书中有关“拉丁美洲”或“大陆上的拉丁国家”的描写带有明显的负面色彩。此外，作品《拉丁美洲和英属美洲：比较巴西与西班牙裔美洲和撒克逊美洲的演变》中收录了曼努埃尔·利马1912年10月在斯坦福大学的6场演讲内容。在演讲中，他指出巴西和西属美洲分别属于已经分裂且“常常敌对”的不同文明，但同时他也强调双方有必要合作以对抗美国的扩张行动。当时有长时间在西属美洲生活经验的巴

西学者相当少。然而，一战结束以后奥利维拉·利马在阿根廷住了近7个月，并随后于1920年发表了《在阿根廷：1918—1919年间的印象》。

前巴西驻华盛顿大使若阿金·纳布科在其与巴西外交部部长和学界友人的来往信件中明确地将自己塑造成美国的崇拜者和泛美主义的拥护者。对于纳布科来说，爱德华多·普拉多的《美洲的幻像》是一本微不足道但却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的作品。在给何塞·佩雷拉·达格拉萨·阿拉尼亚的信中，纳布科写道“《美洲的幻像》使得公众对那个国家（美国）产生了一种不信任，而它却是我们唯一潜在的盟友。”在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纳布科强调说“有两条道路摆在巴西面前：一条叫做美国，另外一条我甚至不知道该将它叫做‘拉丁美洲’‘独立’还是‘孤立’。坦白来讲，我个人是‘门罗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他还写信给亚历山大·巴博萨·利马说“即便语言没有将我们和西属美洲像葡萄牙与西班牙那样分开，巴西还是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美国这边，而不是西属美洲那边。”他的观点“美国在南美洲的扩张是自然的且有益的”断送了他与奥利维拉·利马多年的友好私交。在诸多南美国家中，唯一受到纳布科关注的是当时正处于无政府主义和内战状态且考迪罗主义盛行的智利。虽然他也曾表示，“泛美主义”的真正落实需要以缓和巴西与各西属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前提，但他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研究除智利以外的其他南美国家。

然而，当时的巴西学术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马诺埃尔·邦芬（1868—1932年）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于巴黎完成的著作《拉丁美洲：原罪》中，他指出泛美主义实际上只是“北美霸权”冠冕堂皇的代名词；他还批判了在美国与欧洲盛行的“拉丁美洲（即西属美洲）落后野蛮说”。他指出，这样的表述是为了给对该地区的入侵及剥削行径提供舆论上的合理性。最后，他还为巴西与西属美洲之间在共同情感基础之上形成的休戚相关的手足情谊进行了辩护。^①然而，20年后，在主要创作于1925年的著作《巴西在美洲：巴西形成的特点》中，邦芬却流露出了对西属美洲深深的失望。他写道“拉丁美洲”仅仅是一个地理称谓，掩盖不了巴西和“所谓的拉丁美洲国家”“新卡斯蒂利亚国家”或者“其他的新伊比利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及政治鸿沟。也正是因为这样，邦芬将这本书的第一章命名为《英雄葡萄牙》，而用最后一章《新伊比利亚国家之间的差异》为全书收尾。

^① 参见 Flora Sussekind, “Shifting Frontiers—Manuel Bonfim and *América Latina*: An Introduction”,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2, No. 1, 2002.

著名记者兼文学评论家何塞·维里西莫（1857—1916年）的代表作有《国民教育》和《拉丁美洲的重建》。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强烈谴责了美国在西属美洲和巴西推行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政策以及文化影响（他的此类观点经常被拿来与罗多的看法作比较）。他对西属美洲文学有着独特的认识及鉴赏力，不仅将阿根廷与乌拉圭文学引入巴西学界，还向巴西读者打开了墨西哥及委内瑞拉的文学之门。与当时大多数巴西学者相反，维里西莫并不认为本国的文学或文化是优于西属美洲的，他认为“我们也是西班牙裔美洲人，因为葡萄牙源于西班牙”。^① 尼加拉瓜诗人鲁本·达里奥曾回忆说，在他于1912年访问巴西国家文学院时，维里西莫曾深感遗憾地向他表示“我们是同一片大陆的子孙，出生于几乎同一块土地。我们父辈所属的民族大致相同，或者至少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是，拥有众多共同利益的我们拉丁美洲人却冷漠到将彼此近乎视为陌生人，彻头彻尾地忽略了对方的存在。”^② 与此同时，维里西莫并不看好各西属共和国，也不赞同“拉丁美洲手足同盟”的说法。

为了加强巴西和西属美洲及美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巴西外交部于1909年资助创办并发行了一份名为《美洲杂志》的刊物^③。这份持续发行长达10年（1909—1919年）的杂志收录了西葡两种语言的学术文章，其中不乏西属美洲学者抨击巴西外交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和对泛美主义的支持）的文章。然而，大多数还是由巴西学者为本国外交政策“美国化”和泛美主义辩护的文章。杂志首刊也选用了纳布科于1909年6月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演讲稿《美洲的文明分量》的译文作为开篇之作。

一战后，巴西知识界出现了一批对西属美洲文学及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与作家，巴西与西属美洲之间的文化及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例如，虽然马里奥·德安德拉德（1893—1945年）曾在给阿根廷学者豪尔赫·博尔赫斯的信中承认自己对学界“当下的拉美研究热感到厌恶”，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持续多年的书信交流。再比如，罗纳德·德·卡瓦略（1893—1935年）曾于1922年在里约热内卢盛情款待曾任墨西哥教育部部长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并

^① 参见 Kátia Gerab Baggio, “José Verissimo: uma Visão Brasileira Sobre as Américas”, Anos Eletrônicos do III Encontro da ANPHLAC, São Paulo, 1998.

^② 引自 Fred P. Ellison, *Alfonso Reyes e o Brasil: Um Mexicano Entre os Cariocas*, Rio de Janeiro, 2002, p. 17.

^③ 例如 Any Marise Ortega, “A Construção de uma Ideologia Continental no Início do Século XX: A Revista Americana 1909 - 19”, unpublished thesis PUC - São Paulo, 2003.

承诺在次年访墨期间将就巴西文学发表演说。然而,与许多同时期的现代主义学派学者相同,卡瓦略并不赞成“拉丁美洲”有别于北美洲的观点,他们更愿意将美洲看作是一个整体。对卡瓦略的代表作品《整个美洲》影响更深的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而非其他西属美洲学者。《整个美洲》这首诗也被小说家安东尼奥·奥林托冠以“一个大陆的诗篇”的美称。^①然而,一战之后到二战之前,萨利奥·朱利奥·德阿尔伯克基·利马(1895—1984年)是巴西唯一的“西班牙裔主义者”,他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西属美洲文学及文化的系统推广中,代表作包括《西班牙裔美洲研究》《观点及争论》《玻利瓦尔的思想与心灵》《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作家们》《安的列斯的作家们》。^②

然而综合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巴西学者和他们的西属美洲同仁一样,都更加热衷于研究他们各自所属国家的民族认同感的形成过程。被巴西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包括:国家的概念、民族的根源(土著人、葡萄牙和非洲人),以及种族、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融合等。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若泽·弗朗西斯科·德奥利维拉·维亚纳的《巴西人的演变》和《种族与同化》,邦芬的《历史中的巴西》和《巴西:国家主权的实质》,吉尔伯特·弗雷尔的《种植园上的大房子和茅草屋》和《豪宅与窝棚》,塞尔吉奥·德·荷兰达的《巴西之根》和小卡约·普拉多的《巴西的政治演变》以及《现代巴西的形成:殖民地》。在政界,为强化巴西民众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做出最大贡献的是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1930—1945年)。特别是在教育和公共卫生部部长古斯塔沃·卡帕内马负责文化宣传的新国家期间(1937—1945年),政府通过积极鼓励体制内学者或者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学者(例如卡洛斯·德安德拉德、马里奥·安德拉德、海托尔·维拉—罗伯斯、罗德里戈·德安德拉德、卢西奥·科斯塔和奥斯卡·尼迈耶)大力宣传“巴西人”的国民身份,而“西属美洲”或“拉丁美洲”仍然被称作“另一个美洲”。

与此同时,在二战期间,巴西的美洲特质(或者说巴西的美洲性)受到巴西国内外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从1941年8月(到1948年2月)开始,在泛美主义精神的指引下,为激发大众对包括西属美洲国家和美国在内的“全部美洲国家”的当代文学、学术成果及文化潮流的兴趣,新国家时期的巴

^① 例如 Emir Rodrigues Monegal (ed.), *Mario de Andrade/Borges: um Diálogo dos Anos 20*, São Paulo, 1975.

^② Daniel S. Wogan, *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no Brasil: 1877-1944. Bibliografia de Crítica, História Literária e Traduçõe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48, Introdução, pp. 9-10.

西政府为官方报纸《晨报》增设了一份名为《美洲思考》的周日副刊。在“泛美精神”的指引下，时任《晨报》编辑的卡西亚诺·里卡多认为，美洲大陆是由21个“共和国姐妹”组成的（加拿大被排除在外）。他还强调“美洲人有21种生存方式，而不是1种”。同时他还提出，巴西和美国分别是“固定这块大陆的两支锚”。^①著名历史学家佩德罗·卡尔蒙是卡西亚诺·里卡多的主要合作人之一，他在其代表作《巴西与美洲：一项政策的历史》中强调，建立一个强大且团结的“大陆联盟”可以使美洲人及其文明免遭法西斯主义的侵蚀。此外，卡尔蒙还与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斯宾塞·罗伯逊合作，撰写了《美洲史》系列丛书，丛书包括美国、西属美洲和巴西3部分。

六 巴西成为“拉丁美洲”的一部分

那么，巴西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了“拉丁美洲”的一部分？答案是：在“拉丁美洲”的英文写法取代了西班牙语写法的时候，或者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在二战及冷战期间，当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都开始把巴西看作是拉丁美洲成员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属美洲诸国的政府和知识界才开始将巴西纳入他们的“拉丁美洲”概念。同时，甚至有少数的巴西人也逐渐开始对“拉丁美洲”产生认同感。

早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就在与格兰德河南部诸国的互惠贸易条约中使用了“拉丁美洲”的英文表述。在1901年于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泛美会议上，罗斯福总统表示，美国渴望成为“所有拉丁美洲共和国”的朋友^②。塔夫脱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诺克斯于1909年指派第一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亨廷顿完成扩大和重组国务院的任务。在威尔逊的倡导下，国务院首次设立了包括拉丁美洲事务司在内的多个区域司，但当时的拉丁美洲事务司实际上只处理美国与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之间的事务，对南美国家事务并无涉足。^③事实上，“拉丁美洲”这种表述在一战之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据小若昂·费

^① 参见 Ana Luiza Beraba, *América Aracnídea. Teias Culturais Interamericanas*, Rio de Janeiro, 2008, pp. 14 - 27.

^② 引自 Joseph Smith, *Unequal Giants: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1889 - 1930*, Pittsburgh, 1991, p. 52.

^③ 参见 Francis M. Huntington Wilson, *Memoirs of an Ex-diplomat*, Boston, 1945; Walter V. and Marie V. Schole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aft Administration*, Columbia, MO, 1970, pp. 25 - 27.

雷思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所藏的1900年之前出版的所有英文书籍、报纸或期刊中,没有任何一种把“拉丁美洲”一词纳入标题;在1900—1910年间出版的国会图书馆藏书中,仅有两部书在标题中使用了“拉丁美洲”一词;而在1911—1920年间发表的刊物中,共有23种将该词写入了标题。^①

1918年,美国首部专门介绍“南方国家”历史的学术期刊创办并发行。而早在1916—1917年间,美国史学界就围绕如何为这份期刊命名展开了非常有趣的讨论。首先,包含“伊比利亚美洲”和“拉丁美洲”的两种初始选项都被否定。其中,“拉丁美洲”一词仅被认为是西属美洲国家的总称。后来,史学界以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决定使用《西班牙裔美洲历史评论》。赞成者表示,罗马时期“西班牙”是伊比利亚半岛的统称,既包括西班牙也包括葡萄牙,因此“西班牙裔美洲”也就理所当然既包括西属美洲,也包括巴西。^②除《西班牙裔美洲历史评论》之外,另外一份介绍西葡语言及文化的期刊《西班牙》^③也于1918年开始发行。该杂志主编、斯坦福大学教授奥雷利奥·埃斯皮诺萨指出,用“拉丁美洲”来代指包括巴西在内的整个美国以南区域是“不合理、不公正且不科学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应该是“西属美洲”或者是“西班牙裔美洲”。1926年,美洲历史协会举办了“西班牙裔美洲史学大会”(1938年才更名为“拉丁美洲史学大会”)。1935年,刘易斯·汉克编著了西属美洲和巴西知识界的年度著录《拉丁美洲研究手册》。1939年,汉克出任国会图书馆新设立的分管葡萄牙、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区域事务的西班牙裔基金会(现西班牙裔部)的负责人。

由威廉·罗伯逊撰写的《拉丁美洲国家史》是美国第一部将巴西历史包括在内的拉美史学著作。罗伯逊于1909年开始在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拉美历史,他在其著作《西属美洲解放者亲历的共和国崛起史》的前言中提到,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期间他就非常渴望研究西班牙裔美洲诸国的历史及政治,因为西班牙裔美洲是西班牙及葡萄牙的“野孩子”所居住的广袤区域。同时,他还表明撰写新书的目的是概述拉丁美洲(或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中诞生的

^① 参见 João Feres Jr., *A História do Conceito de “Latin America” nos Estados Unidos*, Bauru, SP, 2004, p. 81 and Appendix 1.

^② 参见 Helen Delpar, *Looking South: The Evolution of Latin Americanist Schola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75*, Tuscaloosa, AL, 2008, p. 50.

^③ 古罗马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拉丁名。——译者注

新兴国家所构成的“西班牙裔美洲”)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此外,赫尔曼·詹姆斯和珀西·马丁在合著《拉丁美洲诸共和国:历史、政府及经济状况》中设立了一个有关巴西的独立章节。1908年,马丁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和罗伯逊都是《西班牙裔美洲历史评论》的创始人之一。自称“巴西主义者”的马丁还曾多次协助翻译了奥利维拉·利马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稿。另一位对巴西感兴趣的美国早期“拉丁美洲主义者”是弗雷德·里皮,他曾为曼努埃尔·乌加特的作品《一个大陆的命运》英文版担任编辑并撰写了引言。

1928年于哈瓦那举办的泛美大会彻底失败,让美国深刻地认识到它与包括南美各国在内的拉美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处在一种令人担忧的状态。一战以后,美国与格兰德河以南的整个拉美地区的贸易往来频率增加,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额也有了显著增长。这种趋势使得华盛顿不得不将对外政策更多地转向格兰德河以南的包括巴西在内的所有共和国。出任美国驻巴西大使超过20年(1912—1933年)的埃德温·摩根曾警告说,美国政府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但不了解巴西,还将其与西班牙裔南美国混为一谈。他提醒当时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源于葡萄牙而非西班牙。巴西和美国都是建立在“非西班牙裔模式”之上的,因此,美国与巴西的政治经济联系必定不同于和西属美洲共和国之间的关系。^①

20世纪30年代,除了要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威胁,美国还要应对欧洲兴起的法西斯势力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地缘政治企图(尤其是德国对阿根廷、智利,特别是巴西造成的巨大威胁)。在此情况下,罗斯福政府采取了面向拉美地区的睦邻政策。随着欧洲局势每况愈下,泛美主义(即美洲联盟)越发受到高度重视。为了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队伍,维护民主制度取得的成果,美国和拉美诸国最终选择团结在“西半球同盟”的旗帜下。从1940年8月到二战结束,在尼尔逊·洛克菲勒的领导下,“美洲共和国商业及文化交流协调办公室”(1941年更名为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CIAA)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通过电影、广播、音乐和印刷品来感召拉美民众的计划。自此,有关拉丁美洲的出版物越来越多,仅20世纪40年代的发行量就超过了150种。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休伯特·赫林的《好邻居: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17个共和国》,地理学家普雷斯顿·詹姆斯的《拉丁美洲》,史学家比米斯

^① 引自 Joseph Smith, *Unequal Giants: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1889 - 1930*, Pittsburgh, 1991, pp. 175 - 176, p. 178.

的《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由哥伦比亚作家海曼·阿西涅加斯编写、哈里特·德奥尼斯等人译成英文的《绿色大陆：拉美主要作家对该地区的全面看法》和由哈里特·布朗和海伦·米勒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我们的拉丁美洲邻居》。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上述著作都把巴西当作拉丁美洲的一部分。从卡尔·洛文斯坦完成《瓦加斯治下的巴西》开始，历经塞缪尔·帕特南对若热·亚马多、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和弗雷雷作品的翻译，以及帕特南个人专著《奇妙的旅程：四个世纪的巴西著作调研》的面市，越来越多专门研究巴西的书籍也逐渐面市。随即，巴西受到了美国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关注，并被认为是拉美地区美国最需要团结的盟友。

二战后美国作为重要的国际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保障并强化这种国际局势，美国提高了对军事及政治战略规划专家的需求量。战争期间成立的民族地理委员会汇集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学术团体协会、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和史密森尼学会的众多专家学者，为编制外交政策和发展教育及科研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政府架构。起初，委员会将世界分为多个“大陆”，但并没有使用西半球、美洲或北美洲与南美洲等表达方式，而是直接采用了美国和拉丁美洲来对该区域进行划分。^①随后，委员会开始依照地理、地缘政治以及文化的相似度，采用“地区”的概念来划分世界。跟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格兰德河以南的各拉美国家在宗教、语言与文化、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相似性和凝聚力，因此“拉丁美洲区域”也就自然被用作这一地区的代名词。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标准忽略了西属美洲与巴西之间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差异（除宗教以外）以及巴西与该地区其他国家（除墨西哥之外）之间在国土面积与人口总量上的巨大差别。

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初期，美国官方开始频繁使用“拉丁美洲”代指格兰德河以南、包括巴西在内的广大区域。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其他国家政府、多边组织（1948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成立，它是第一个负责“拉丁美洲”地区事务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以及学术团体。特别是在古巴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对“拉丁美洲研究”的热情急剧高涨。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不仅被认为是有别于北美洲的区域，而且更多地被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第三世界“问题区域”。在塞缪

^① 参见 Wendell Clark Bennett, *The Ethnogeographic Board*, Washington, D. C., 1947;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97, p. 163.

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以巴西为中心的拉丁美洲地区因其特殊的身份特征而被认为是区别于西方世界的“独立文明体”。^①

二战结束之初，作为经济与地缘政治方面关键的合作伙伴和联合国大会最大的投票集团区域，拉丁美洲曾一度受到了美国政坛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冷战愈演愈烈，由于苏联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并没有大面积蔓延到拉美地区，美国政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受苏联威胁更深的欧洲、中东和亚洲地区。由于拉丁美洲对美国综合战略重要性的下降，1946年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CIAA）被解散；同时，面向拉美的“马歇尔经济援助计划”也被取消。1947年8月，杜鲁门在华盛顿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一个半世纪内，美国对西半球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即‘门罗主义’。”^②罗斯福政府期间任美国驻巴西大使（1945—1946年）的阿道夫·贝勒曾在批判华盛顿对该地区的“冷漠和无知”时表示“华盛顿已经把拉丁美洲完全抛于脑后了。”^③转机似乎出现在肯尼迪政府期间。为了化解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提议建立一个促进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联盟。然而，危机化解后不久，除了对巴西（1964年）、智利（1973年）和中美洲（20世纪80年代）内部出现的共产主义势力进行直接或间接镇压之外，美国由于无暇顾及拉丁美洲而再度失去了对该地区的兴趣。

相比20世纪初美国和巴西维持的特殊同盟关系以及二战期间巴西对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战后的巴美关系让巴西政府感到非常失望。此时的美国将巴西仅仅视为南美洲20个共和国成员之一，而非拉丁美洲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共和国。巴西既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也没有再从美国那里得到特殊的经济援助。鉴此，尽管巴西外交官在公开场合仍表示支持美国，且在冷战中站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这边，但瓦加斯政府却开始推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如1951年巴西拒绝与美国一道出兵朝鲜。在雅尼奥·夸德罗斯和若昂·古拉特时期，巴西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但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而且加强了与中国、亚洲和非洲“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支持它们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还特别改善了与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6, pp. 45–46, p. 87.

^② 引自 Leslie Bethell and Ian Roxborough (eds.), *Latin America Betwee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Cold War, 1944–1948*, Cambridge, 1992, p. 22, note 15.

^③ 引自 Jordan A. Schwartz, *Liberal: Adolf A. Berle and the Vision of an American Era*, New York, 1987, p. 312.

处于革命中的古巴的外交关系（但并没有顾及及其他西属美洲国家）。

而同时期的美国政府虽然降低了对整个拉美地区的兴趣，但仍将巴西视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1964年暗中支持巴西军人政变之后，更是把军政府独裁统治下的巴西纳入盟友的行列。然而，巴西方面却经常因为贸易与核能领域的摩擦，与美国保持了一种低烈度的冲突，特别是在埃米利奥·梅迪西和埃内斯托·盖泽尔执政期间。虽然巴西没有公开参加不结盟运动，但它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如中东国家和南非）独立的外交导向，常常与美国的利益及对外策略发生矛盾。然而，正如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在1970年提出的那样，此时的巴西处在军政府独裁时期，急于“脱离香蕉共和国的地位，并开始扮演大国角色”^①。1940—1980年之间，拉丁美洲地区的人口从4000万增加到1.7亿，经济总量以年均7%的增长率迅速攀升，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然而，巴西仍然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扮演该地区领导者，当然也就更无法扮演美国国务院所期望的区域“警察”的角色。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由于初期核武器计划和巴拉那河的伊泰普大坝争端，巴西与阿根廷的关系空前恶化。到80年代，巴阿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首先，巴西于1980年加入了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随后，巴阿两国都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民主制的推行又催生了《亚松森条约》（1991年）和南方共同市场（最初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组成，后来智利和玻利维亚成为联系国）。然而，与西属美洲邻国联系的常态化并不足以成为巴西外交政策“拉美化”的证据。二战结束后的40多年间，巴西被美国等一些国家看作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同时期的巴西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与西属美洲国家相似的道路，而且瓦加斯政府的“西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它与多个地区邻国的距离。但是，这并不代表巴西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已经达到了深度接触的程度。

七 二战后西属美洲与巴西之间的学术交流

二战后西属美洲知识界与巴西学者、作家、艺术家及批评家之间的对话频率有了明显的提高，认同“拉丁美洲”这种表述的西属美洲学者在对待巴西的理论和作品时也表现得更加宽容，然而，这还是没能改变巴西学者始终

^① 引自 Carlos Fico, *O Grande Irmão da Operação Brother Sam Aos Anos de Chumbo. O Governo dos Estados Unidos e 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Rio de Janeiro, 2008, p. 271, note 77.

被拉美学界边缘化的状态。对“拉丁美洲”概念阐述最多的拉美学者是墨西哥的莱奥波尔多·塞亚（1912—2004年），然而，在他出版的众多作品当中没有一部给予巴西与其他西属美洲国家同等的地位。当然，也有少数同时代的拉美本土学者对这个“葡萄牙帝国的儿子”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他们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智利学者阿图罗·托雷斯—里奥塞科（1897—1971年）、乌拉圭学者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尼高尔（他于1977年在纽约编辑并出版了共两册包含巴西文学的《拉丁美洲文学选集》）和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代表作为1971年于哈瓦那出版的畅销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学者中很多人都曾长期在美国一流大学的西班牙或葡萄牙研究所及院系任教，例如，托雷斯—里奥塞科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40余年，而罗德里格斯·蒙尼高尔也在耶鲁大学工作了15年。

与此同时，更多的巴西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也开始对西班牙裔美洲文化和思想感兴趣，代表人物是著名诗人曼努埃尔·班德拉，他于1949年出版了专著《西班牙裔美洲文学》。20世纪60—80年代，几位著名的左翼学者甚至开始为“拉丁美洲人”的身份认同进行辩护。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改变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冷战期间拉美各国学者之间频繁的对话。巴西学者对“拉丁美洲”的认同往往与他们在军政府独裁时期多年流亡于乌拉圭、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生活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与智利学者恩佐·法莱图在墨西哥城发表了合著《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曾在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学习并深受普雷维什“拉丁美洲化思想”影响的塞尔索·富尔塔多撰写过两部有关拉美经济发展的著作，分别为《拉丁美洲发展的落后与停滞》和《拉丁美洲经济结构》。在德裔拉美主义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著有《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一书）的影响下，鲁伊·玛乌罗·马里尼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发表了多篇讨论“依附论”和拉美社会现状的文章。在流亡期间，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发表了《美洲与文明：论美洲人的形成过程及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拉丁美洲的困境：权力体系与反动势力》。回国以后，里贝罗还发表了论文《拉丁美洲：大祖国》。同时期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巴西学者是因“葡萄牙巴西特殊主义”论述而广为人知的弗雷雷。他在1963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美洲特性与拉丁特性》中写道“如果把伊比利亚半岛文化定义为西班牙文化，巴西则是一个巨大的西班牙，一个双重意义上的西班牙（同时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对弗雷雷来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巴西

在内) 都是“热带的美洲国家”, 并且同属于一个跨国界的泛西班牙文化圈。

然而, 公允地说, 大多数巴西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巴西人一样, 不仅仍然认为“拉丁美洲”指的是“西属美洲”, 巴西不属于拉丁美洲的一部分, 而且自认为他们本质上并不是拉丁美洲人。

八 冷战结束后巴西和南美洲的关系

接下来, 让我们谈谈巴西与“拉丁美洲”关系史的最新发展情况。冷战结束以后, 世界政治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 尤其是巴西本身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在卡多佐(1995—2003年)和卢拉(2003—2010)政府时期, 巴西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涉及“南北”与“南南”关系、全球贸易、多边组织改革和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中, 巴西开始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此外, 巴西、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新兴国际力量。

与此同时, 巴西同拉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首先, 巴西继续支持成立于1948年第九届波哥大泛美大会的美洲国家组织, 自1994年以来巴西总统出席了全部7届美洲峰会。但与此同时, 巴西政府抵制美国的“西半球经济一体化计划”议程。1986年巴西参加了由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组成的里约集团年会, 目前则支持2010年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不过, 巴西也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积极奉行一种同其南美近邻谋求政治和经济双重接触政策, 这种有意识的决定是1992—1993年期间特意做出的, 而1994年墨西哥同美国和加拿大联手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又强化了这一决定。卡多佐总统出席并主持了2000年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一届南美国家领导人峰会。2004年10月在库斯科第三届峰会期间(卢拉总统任期内), 南美国家共同体成立, 由包括圭亚那和苏里南在内的12个南美国家组成。在2008年5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峰会上, 南美国家共同体更名为南美国家联盟。改善与南美邻国的关系, 特别是推进南美洲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 是卢拉政府时期巴西外交政策的主要导向。至此, 尽管巴西还有诸多踌躇、迟疑和矛盾, 但同样开始历史上第一次自视为一个地区强国——这不仅在于巴西的长期经济和战略利益, 而且因为巴西外交部认为成为地区强国是成为全球强国的必要条件。然而, 这里所指的地区是南美洲, 而不是拉丁美洲。

(翻译 陈晨; 校译 郭存海; 责任编辑 黄念)

99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zil and Latin America from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slie Bethel

Abstract: This essay , partly history of ideas and partl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examines Brazil's relationship with Latin America. Since the publication in 1968 of John Leddy Phelan's influential essay ,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 it is believed that "Latin America" was originally a French concept used by French intellectuals to justify French imperialism in Mexico. However , the expression was in fact first used years earlier by a number of Spanish American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who lived in Paris ,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common legacy shared by all the Spanish-speaking republics in defense of re-colo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 si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expression , being the only Portuguese ex-colony among dozens of Spanish ex-colonies , for more than one century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this continent , neither Spanish American intellectuals nor Spanish American governments considered Brazil part of "America Latina" . For their part , Brazilian intellectuals and governments only had eyes for Europe , and later increasingly on the United States , with which maintaine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he relations between Brazil and its Spanish American neighbors were extremely limited with one notable exception: the Río de la Plata where Brazil , like Portugal in th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 had strategic interests. When ,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ld War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gan to regard Brazil as part of "Latin America" , Brazilian governments and intellectuals , except for some on the Left , still did not think of Brazil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egion. Though Brazil continued to be on the 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in the Cold War , no special role in the post-war global order or special economic assistance was offered in return as expected. Disappointed for being tre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ar as simply one of Latin American republics , Brazil adopted a mor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since Vargas Adminis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 it pursued a major development in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in by pursuing a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 its South American neighbo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Key words: Latin America , republic , monarchy , Pan Americanism , Brazilian-U. S. relations

123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Latin America: Evolution , Activities and Effects

Song Xiaoli , Han Zhaoying

Abstract: Public diplomacy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of Chinese diplomatic strategy for Latin America. Public diplomacy had paved the way for initial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within 2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 and laid the cognitive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ino-Latin America relations after the 1970s. Since the new century , along with the leaping development of Sino-Latin America relations , China has actively arranged 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Latin America. It 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on one hand , and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on the other , via various channels and with different targeted groups. On the